



作者简介

张守伦，四川万源人，现居成都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发表过论文、散文和诗歌。出版有《中外历史知识精析》《巴蜀掌故集萃》(合著)《心路清音》等著作，其中《老屋》(作词)等作品在央视播出；曾获得四川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和四川省报纸副刊奖。

我家的小菜园

十多年前搬新居的时候，十来平方的露台怎么利用起来？左邻右舍有搭建成阳光房的，有用砖砌起一间房来的，也有让它露在外边的。经过和家里人几番商量，我家的露台建成了一块小型的菜园，在园子的一角还栽了一棵从千里外的老家带来的香椿树苗。随着节气的变化，园子里种上适宜的蔬菜，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收获，在钢筋混凝土垒起的城市森林里，享受到难得的田园情趣。

菜园不大，我尽量多种些不同样的蔬菜，辣椒、四季豆、黄瓜、丝瓜、南瓜、西红柿、萝卜、白菜、葱和蒜等。同一季节的蔬菜，每一种都种上几窝。一年四季，园子随时令更新，蓬勃出生机，养眼之后，还享有收获后的口福。

近两三年，外出的日子少了，宅家的时候多了起来，对菜园的亲昵自然胜过以往的年月，拨弄园中的菜蔬心细了许多。当然，也鲜活地印证了天道酬勤这个道理。

儿。

当年栽下的那棵香椿苗子，已有碗口粗几米高，采摘香椿芽也好几年了。清明前后香椿树的枝头上开始冒包发芽，谷雨前后香椿树的枝头上尽是紫红色肥嫩鲜美的椿芽，香味浓郁，惹人喜爱。往年采摘不过一两次，今年间隔一周就可采摘一次，已不下四五次了。采下的椿芽一次难以吃完，我用保鲜袋装好在冰箱里储存起来。椿芽的吃法很多，通常用它炒鸡蛋，味美不说，关键还很营养。不过，香椿的吃法，最难忘的还是小时候的凉拌椿芽。

记事起，屋前田坎上就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树。每年春天的时候，都要采摘下很多的椿芽。母亲把椿芽焯水后，从泡菜坛里面捞些酸辣椒，剁成碎沫，再舀出些酸盐水，然后混合拌匀，一道凉拌椿芽就成了。那时候油少，甚或没有，更不必说有时下那么丰富的调料，但忆及“妈妈的味道”仍垂涎不已。

方横着的自来水管上装有多个水龙头，龙头里的水常常是牵成线流，即使这样还不能持续下去，流着流着就开始“滴灌”，继而滴也不滴了。厨房旁有一间低矮的棚状锅炉房，一口小锅炉烧水，早中晚用餐的时候开放。打开水限定不能用桶，只能用水瓶，每瓶付 5 分钱的开水费。洗脸洗脚几乎都用冷水，衣服多是到两里外的小河里去洗，冬天手脚都生冻疮，痒痒难耐，整夜难以入睡。洗澡，夏天还好将就，冬天麻烦烦多了，要等到周末上城边的工厂对家属业的澡堂洗，付费不说，往往买不到澡票，买到了澡票要等很久才能排上号，或者是排上号，又没热水了，“英雄白跑路”的时候居多。

由于缺水，我们常到附近的县医院去打水。次数多了，去的人又多，引起院方注意。

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晚自习结束，又停水了。再到县医院打水是不可能的事，只能上两里外的那条小河洗漱。返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提着或者端着盛满水的水桶和脸盆，肚子里唱着“空城计”。月光下，路边地里的黄瓜和还有几分青涩的苹果特别亮眼，惹人眼馋。虽然知道“盗泉之水”和“嗟来之食”的故事和那个理，但是最终都成了“饿”的俘虏，可怜的黄瓜和苹果遭遇上了悲惨的命运。这事，大伙心里愧疚了很久一段时间。

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，学校换了校长。在见面大会上，新来的校长自我介绍说：本人姓伍，名正方，正方方的正，方方正正的方。随后阐释了他办学治校的理念和将要实行的改革主张。听后心里起了些波澜，激起了一阵兴奋。接下来的两年里，印象深的是吃饭、学业考核与分配的事。

国家给每人每月三十斤粮食和 17 块 5 作为生活费。进校的时候，学校统一置办伙食，一天三餐统一时间，实行桌餐。每桌

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西红柿和二荆条辣椒，今年似乎特别有出息，长势蓬勃，花开繁茂。四月以来，几乎不用去菜市场就可以吃上这些新鲜的时蔬。黄瓜和二荆条辣椒我尤为喜欢。菜园里，两三天就能摘上几根黄瓜，生吃、凉拌、泡黄瓜或者煮汤，我吃了个遍。那二荆条辣椒呢，椒角细长，椒尖成“J”型弯钩，晶莹碧绿，摘下嫩嫩的“二荆条”，炒一盘“煎辣椒”，味蕾大开，饭也会多吃上两碗。疫情的波及和影响对我们也不小。女婿从南充回来，健康码突然变成了“黄码”，全家人宅家隔离的那几天，小菜园在这“危难”的时候成了我家的蔬菜供给站，出力帮忙不小，说得上功莫大焉。

自从有了都江堰，成都平原自流灌溉，土沃水美，千百年来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，誉享天府，

天底下最大的事莫过于有饭吃。“民以食为天，食以粮为主”。

中师的那些记忆

八人，推选一人当桌长，负责分配饭菜。且不论饭菜是否足量，一桌人每餐不仅不可能同时到齐，就是桌长的手上功夫也难均衡无差。一桌人一天两天尚可，长时间里自然怨气不小，矛盾愈来愈大。十五六岁是吃长饭长身体的时候，饭菜油水少，饭量都大，特别吃得。待邻桌人还没有到的时候，把饭菜拿来分吃的事时有发生。

为此，受批评写检讨的不乏个别。不过，丢一阵子脸之后，大多淡忘。新来的校长解散了桌餐，把供给的粮和钱，转换成饭(面)票和菜票发给个人，食堂饭菜种类也多了起来。吃多吃少吃啥，自个作主，自个选择，不够吃的可以加购饭菜票票，这件事在学生心目中给新来校长加分不少。但是，问题也来了，伙食的质和量较之前并未有多大的改观，因为吃饭，对伙食团长和后勤主任怨声爆棚，教育部门召开了座谈会，听取了意见，后来有了不小的变化。

那时候，中师毕业工作不愁，但一般都是到偏僻的山村小学任教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这一届毕业实行德育、智育、体育“三育”成绩总分排序，分配时从高到低自己选择分配去向。总分百分制计算，德育、体育占比各二十分，智育占比六十分。毕业时，县城的小学有分配名额，我总分的序次选择去县城小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幸运的是这年又有选送上大学的机会，尽管回来是到乡下中学任教。自己的学识见识，有几斤几两，我心知肚明。于是，我选择了上大学继续读书。

离校的那天，去向讲授“文选与习作”的老师道别。他微笑着又不乏几分严肃地对我说，出了学校，进入社会要学会适应环境，但不要被环境把自己的棱角全部磨没了，心中应装有一枚“铜钱”，外圆内方。

“铜钱”，外圆内方？那时候，我似懂非懂。

迅哥

的事，弟兄妯娌之间的拌嘴吵架，一代甚或两代之间记怨记恨，死不住来，在村里不是新鲜事。他们家族也免不了有了这样的事情。遇逢这种事，迅哥不选边站队，不添油加醋，不拉偏架，哪怕一方是亲娘弟兄，他劝和说好，做公道的中间人。在家族中，不同辈份的人都很待见他这个“么哥”“么叔”“么爷爷”。

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，三哥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弟兄姊妹中，只有大姐没有上过学。这或许是早些时候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以为读书是儿子们的事。大姐勤劳，明事理，但没有文化，生活中“睁眼瞎”的尴尬，常有发生。每每这时，迅哥总会包容体谅，和和气气。他们家的殷实在村里很有名气，无论是大集体生产还是后来田地到户的日子。对我们家，缺钱给钱，缺粮送粮，特别是对还在读书的我资助颇大。人们常说贤惠的女婿胜过半个儿子，这话用在迅哥身上没有半点的夸张。

近十多年里，村上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，留在家的是青一色的老人和小孩，或者是有残疾或患有病痛的人。田地抛荒，房屋垮漏的不少。迅哥和大姐把自家名下的田地种好，还把外出务工亲朋的一些田地捡过来种上，一年仅水稻就要收几千斤，小麦、油菜、红苕、洋芋、玉米等作物收成也不少。喂养猪养鸡养鸭也没落下，喂牛方便了耕田犁地，养的猪和鸡鸭不仅经济收入不

先生一词，时下用得宽泛和廉价，我用先生这个词倒是小气和吝啬。但是，称杨蕴成老师先生，是来于我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敬仰。

三十二年前的暑假，我在四川教育学院(今成都师范学院)新都教学点上与先生初识。先生时值不惑，面容慈祥，眼里充盈和善，青春不乏内敛。

教学点上的一间大教室里，没有空调，只有讲台靠门一侧有一台落地的风扇。室外的阳光白亮得刺眼，室内闷热透不过气来，四十多位同学不停地扇动着手中的扇子或者书，但还是难抵汗水的激情澎湃，应验了热得拳头揩汗的俗话，听课自然打了不少的折扣。

先生来上课的时候，那台落地的风扇被放到了教室的中间，先生让我们围坐成一个大的圆圈，让我们享受了风扇的凉风的普惠。开讲之前，先生说：“大热天来趟成都面授不容易，课时又有限，教材上的内容我不讲了，讲义上有的也不讲了，我想以专题形式就重要的历史事件、人物和史学界有些争议的问题谈些个人的心得，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。”先生授课时，声调不高，和颜细语，娓娓道来。但是，析事晓理，视野宏阔，通透独到，极富吸引力，大热天里有股和煦的清风拂过心田的感觉。

1990 年初，我因招聘调到双流县中任教。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，得到了先生许多的帮助，这帮助不只是精神和专业上的，物质上也是颇巨的。与先生接触和交往多了，对先生了解也多了起来。先生小时候因腿病残疾，高中毕业就到了工厂做工。尽管这样，先生与书为友，从未放弃学习。恢复高考后的 1978 年，先生高考获得了全省文科第三名。上了川大历史系，毕业后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。

在教院读书的时候，我听过先生评教授的趣事。第一次评教授的机会，各项条件先生都无可争议。然而，先生觉得研究的成果还难与教授相称，遂放弃了申报。先生不申报，其他老师也就只能作罢了。随后先生撰写了多篇极有分量的研究论文，在多家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后，方才申报教授评选。这件事，我问过先生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教授称谓应该是名与实相符，徒有虚名，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

每年上先生家或在外面都要聚几次。在成都，先生往往抢先就把费用预付了，原本是尽个心意，常常让我反到尴尬，过意不去。为了破他这个惯例，我故意不选择在成都，而让先生动步，以方便掌握东道主的主动权。2018 年教师节前夕，约先生和江渝老师来双流小聚。江老师小先生几岁，是大学同学，又是同事，关系有如兄弟，曾任成都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院长。因为先生，江老师对我厚爱有加，帮助很大。餐后茶叙，聊到身体的重要，见江老师身体消瘦，气色欠佳，我问原委。江老师说，他每天坚持运动，还坚持冬泳，身体体检各项指标没发现问题。先生在一旁笑着说，适量的运动是可以健身的。我约春节我们再相聚。江老师说，春节他到新加坡与女儿女婿过节，只有过了春节“五一”回来再聚了。

“五一”之前的一天，先生电话告诉我，江老师回来就住进了医院。顿时，我很是震惊。江老师出院后，我上家中去看望了几次。后来他又住院了，就再不告诉我他住院的地方了，拒绝我的探望，理由是怕给我添麻烦。直到去世处理后事，江师母按江老师遗嘱，才电话告诉我“江老师走了”。没能见上江老师最后一面，送上最后一程，至今内疚。

我知道先生身体不是很好，但精气神不差。他病得严重却从未对我说过。江老师去世后，才告诉我：2013 年，医院确诊先生是间质性肺炎，十多天连续输入大剂量抗生素后，免疫系统紊乱。2014 年 6 月血小板突然降低至 1，都未查出病因。激素治疗已经没有效果，后来每月需注射十多支药物才能勉强维持稳定指标。此时我幡然醒悟，前些年有几次见先生时，先生口腔、舌头及身上出现成团的乌块，问及原委，先生总是淡淡地说，血小板出了点小事，碍事。

先生家里藏书很多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眼睛看纸质品吃力，好几次言及其所藏书籍，特别是文史方面的，让我挑选拿走。难却先生爱意，我分三次搬走了先生不少的藏书，每一次我心里都有很难过的感受。我理解先生与自己珍藏书籍的那份依恋的情愫，以及先生把自己珍藏的书籍赠我的那份厚望。

2020 年国庆前夕，先生住进了医院，因疫情，医院拒绝探望，先生说等出院了他联系我。春节前夕，先生出院了。先生身体极度虚弱，活检取样确诊已是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晚期，颈部和腹腔内出现大量的包块。听说我要上家里去看望先生，师母特地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，席间先生不停地给我挟菜、盛汤，劝我不要讲礼，随便些。不时还谈笑风生，我知道先生这是让我不要担心他，看不出先生是一位已是癌症晚期的病人。

清明假期的一个晚上，接到先生儿子的电话，说先生病危，已处于昏迷状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上医院看望先生。先生从昏迷中醒来，用低微的声音说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随后，又昏迷过去了。看着被癌症折磨痛苦中的先生，我噙着泪水走出了先生的病房。

2021 年 5 月 3 日，上午十点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默立在先生的灵柩前，我悲伤的情感在心里禁不住翻涌流淌。先生走了，先生的道德和文章还鲜活在人间。

蕴成先生